

徐铸成



憶 雜 聞 舊

續 篇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旧闻杂忆续篇

徐 铸 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宇心

封面题字：傅晏风

封面设计：杨守年

旧闻杂忆续篇

徐铸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6.375 插页 4 字数128千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500册

书号：10118·553

定价：0.64 元

序

继《旧闻杂忆》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准备把香港三联编印我的另一本集子——《炸弹与水果》出版在国内发行。我自然很高兴和感激。

这些，都是在天日重光、我恢复了“旧闻记者”以后陆续写出来的，基本上全是亲身经历的陈年烂谷子的事。所不同的，《炸弹与水果》^①中，还夹杂几篇较新的回忆，那是为了纪念亡友，乘他们得到平反昭雪之际，沉痛写的有关沈志远、傅东华、李平心、浦熙修等同志的悼文。还有，去年我赴港重游旧地，怀念当年共同创业的好友，写了三篇有关唐纳（马季良）同志的文章。内容更加芜杂了，我本想取名为《百衲集》，它是各种料子拼凑起来的。

今年十一月，我赴厦门大学讲课十余天，曾参观鲁迅纪念馆，想起了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到

^①本书在海内出版时，征得作者同意，书名改为《旧闻杂忆续篇》。

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想，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平凡的回忆，所以有人要看，大概也是好奇而关心我过去的遭际吧。

有些朋友说，由于我曾搁笔了二十年，“坏事变成好事”，所写的东西，没有那种套话和废话，比较朴质。我听了曾沾沾自喜，但自己细细地加以检查，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既是文“风”，而且吹遍大地达十年以上，所有夹杂的污染、细菌，总会呼吸入人们的肌体，毒害人们的四肢百骸，要避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我并未生活在真空中，所看到的，呼吸着的，当然也是这一套，何况还要奉命学习，奉命背诵，还被勒令照这一套不断写“检查”，写“思想汇报”，积渐成习，要一下子肃清那一套，谈何容易！正如有些习惯于偏视的人，一旦看到正常的事物，往往要惊骇一样。

我们的祖国，经历了千灾百难，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切实地走向振兴的道路，统一的现代化强国的蓝图，已在地平线上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谁都不能袖手旁观。衰颓如我，也应尽其棉力，作出贡献，而自问可能尽力的，只有把过去所知所闻的一切，加紧写出来，供历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的参考。马齿日增，记忆力明显在衰退，在我，也有一个自我“抢救”的问题。

这是我真实的心愿，决不是一番套话。

1982年元旦于上海

续 篇 前 言

《旧闻杂忆》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开始动笔，迄今已时逾一年半。第一册出书后，又写了几十篇，稍加补辑，似乎又可以作为第二册出版了。

杂忆，其实近于随笔，这个体裁，似乎最合老年人的胃口，不拘长短，不分先后，想到什么可写的，就写下来。一般年纪大一点的人，总有“健忘症”，如果要拟订好计划，从头写起，也许会把忽然回想到的史实，轻轻放过去了。

比如，我刚写到太平洋大战后逃离香港，接着就联想到一九四九年第二次离港的经过，时间一跳就是七年，而这七年中，在桂林，在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的搏斗，有很多值得写的史料，还没有记述。再如，这两三年，平反昭雪，很多死友的追悼会先后召开，我也该及时写出我的追思和悼念。这里，就有平心、沈志远、傅东华几篇。还有，关于邓拓、姚溱、王造时几位，都曾有过密切的接触，因为要回想得周全些，还没有写出。

这样，写起来较方便，却给读者造成了不便，忽前忽后，错落过多，时代背景如何，来龙去脉，难以寻考。

为了稍稍弥补这个缺陷，不揣愚妄，不妨简单地自订一个“年谱”，以便查考：

一九二二年（十五岁）至一九二六年夏，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就读。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入北京清华大学，是新制大学部第二班的学生。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入保定河北大学。下半年转入北京师大。是年冬，入国闻通信社。从此，半工半读，当了新闻记者。

一九二九年秋，调至天津《大公报》当编辑，并不时被派到外埠，采访重要政治新闻。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

一九三六年调到上海，参加筹备创刊《大公报》上海版，任要闻编辑。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沦陷后，参加创刊的《文汇报》，任主笔。

一九三九年五月，《文汇报》被迫停刊，八月，到港任《大公报》编辑主任。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香港《大公报》停刊，翌年二月，辗转到桂林，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

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赴重庆主编《大公晚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九月到上海，筹备复刊上海《大

公报》，任总编辑。

一九四六年三月，向《大公报》当局辞职，重入《文汇报》，任总主笔。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被封闭。

一九四八年三月，摆脱监视，到港筹备香港《文汇报》，九月初创刊，任总主笔兼管经理部事务。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离港赴北京。五月回上海，继续主持上海《文汇报》。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度赴京任《教师报》总编辑。旋《文汇报》复刊，仍回上海。

一九五七年三月，任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团长，赴苏参观访问十个加盟共和国，历时五十天，五月初回国。是年七月，被迫去职，下乡劳动学习。

一九五九年，转入出版界工作。

十年浩劫中，有四年在“五七干校”。

从这简单的经历中，可见我的确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职业报人，平平淡淡，一心只想“勤勤恳恳办报，清清白白做人”。今天，在饱经风霜以后，总算恢复了本来面目。而年逾古稀，一生中应是最成熟的二十几年，已白白浪掷了！

最近，看到日本报载，邓小平同志曾对日本朋友说，在台湾，和自己同年的人，有知名的谷正纲；蒋经国先生曾和自己在莫斯科一起呆过，也已七十岁了。希望能在两人健在时，见一下面。这也是他的杂忆吧，多么有人情味。

三十多年来，由于人为的隔绝，“人生不相逢，动如参与商。”其实，参与商本是一颗星，正如我们都姓“黄”

——黄炎子孙一样，何必总要象怒目金刚呢？

我在回忆往事时，很多老朋友、老同业的音容笑貌，就常常跳出来，如成舍我、陈训畬、李秋生、许孝炎等，这几位，虽然过去所走的路有所不同，总还保持着谅解和友谊。在台湾的新闻界中，大概很少有相熟的人了，而邓友德则曾是我的好友，领导文坛的陈纪滢兄不仅是天津《大公报》的老同事，我们还在汉口《大光报》一起工作过，他那时是该报的主干，我则参加“客串”。此外，可以叙旧的海外朋友还很多。

前些日子，我曾为一本青年刊物写稿，介绍蒋经国先生。文中说，隔绝双方的台湾海峡的那根绳子该抽去了，让我们暂时各行其是，互通有无，大家努力把经济“起飞”，把国力培养起来，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奠定富强、康乐和不败的基业，对历史交出一份辉煌的卷子。

经过一阵暴风雨以后，我们可爱的祖国看来已进入成熟的时代，理智的时代，兴旺发家的时代了。

让我把这本小书，敬献给海外的朋友们，祝他们愉快、健康、长寿，早日欢聚，互谈契阔吧！

1980年7月上海

目 录

序.....	1
续篇前言.....	3
大世界的炸弹.....	1
小康之局.....	4
刀光剑影.....	7
“七七”和藏本事件.....	10
举办助学金.....	12
香江怀旧.....	15
第二次到香港.....	18
日汪密约的揭露.....	21
日军进攻香港.....	24
两个“一夜之间”.....	27
北江之墟.....	30
再次道别香港.....	33

初进解放区.....	36
一次难忘的访问.....	39
第一面五星红旗.....	42
报坛与书场.....	47
评弹忆昔.....	50
新春怀旧.....	54
元宵戏.....	58
“密苏里奖章”.....	62
砸碎了铁饭碗.....	65
《文汇报》的摇篮.....	68
我的一篇社论招来炸弹.....	71
炸弹、手臂和水果.....	74
没有什么独得之秘.....	77
意想不到的“起飞”.....	80

初次交锋.....	83
借题发挥.....	86
最后较量.....	89
四大家族的收买.....	92
一次“鸿门宴”.....	98
《文汇报》被迫停刊经过.....	106
《导报》与《译报》.....	111
记李书城.....	114
王瑚的诙谐.....	118
记许世英.....	122
蓬山虽远 一苇可通.....	125
方振武之死.....	128
重逢王耀武.....	132
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	136

青年时代的徐悲鸿·····	139
柳亚老和陈叔老·····	142
老马识途·····	145
包达三谈往事·····	148
怀念沈志远·····	151
李约瑟和胡道静·····	155
傅东华——一个被遗忘的人·····	159
傅东华与邵飘萍·····	162
忆唐纳·····	166
唐纳以外·····	171
喜读唐纳来信·····	175
平心二三事·····	177
因平心而想起的二三事·····	180
两位杰出的女记者·····	183
滔滔万里长江·····	188

大世界的炸弹

“八一三”以前，上海租界里的房子，还不象以后那么紧张。比如，我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住的那幢住宅，面对公园，离闹市的霞飞路也不算远，地段算是好的。我住进去时，这个弄堂还有四五幢没租出去，我和经租处订约时，订期两年，还享受了两个月的免租待遇。

“八一三”一声炮响，南市、闸北乃至江南各处的难民拥进了租界，这才出现了以金条顶屋子的事。从此，洋场十里就真正成为寸金地了。

在沪战的四个月中，住在租界里的人，基本上是“隔岸观火”。先是浦东、闸北，天空升起乌黑的浓烟，以后是沪西，等转到南市，“国军”就“转移阵地”，上海成为被遗弃的孤儿了。

四个月里，租界居民也受到两次较大的惊慌。一次是大世界门前落下炸弹，一次是一枚流弹不知怎么炸中了南京路闹市的先施公司，炸坍了三层商场的一角。这两次下的

“蛋”，都是国货。而租界人民，并无怨言。

大世界那个炸弹，我是目击它落下来的。

我们的报馆在爱多亚路山东路附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隔壁，是一幢四层的房子。我们时常跑到屋顶去看所谓空战。白天，往往是来了一两架中国飞机，经敌机升空一打就溜了。晚上，差不多总在八、九点钟，先听到敌方的一轰高射炮声，然后有飞机声掠空而过，有时也听到炸弹声。事后总接到我方战报说，我机英勇炸中了敌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还报道了其他辉煌的战绩。直到上海上空的战火最后停歇以后，有一次我去外滩，却看到那艘大约至多只有千把吨级的“出云”舰，还安然停靠在苏州河口，似乎什么弹痕也看不出来。难道也是“擒贼先擒王”么？我真不解，为什么对那么个小东西，值得花那么大的代价，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大世界惨案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编辑部看报，忽然听说浦东上空正在空战，连忙跟几个同事登上屋顶瞭望。忽然，看到一架飞机曳着一条黑烟由东西驰，仿佛正在我们头顶，掉下一个小黑球。接着，从西边传来了一片火光，一声巨响。马路上马上人声鼎沸，说是大世界落下了炸弹，死尸成堆，血流成河了！

事后，我经过大世界，看到马路中央的警亭确是完全炸毁了，大世界门面焦黑，但无损坏，象烫伤的人一样。马路上死尸已被移走，而附近的墙壁上，还有斑斑血迹。

那天，我们的同事蒋荫恩兄神话般地幸免于难。他那年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受聘来馆任外事记者。那天，他

坐了报社的汽车赴沪西某地去采访，行经大世界时，正好对面亮起红灯。司机阿四一向开车很猛，他不顾一切，开足马力冲过去了(当时上海的“行话”叫抢红灯)刚开到大世界以西不到一百公尺的南京大戏院附近，就听到后面一声巨响。他们没有停车，继续西驶。

以后，我和荫恩兄在香港、桂林报馆同事了多年。四二年秋，他应聘赴成都任燕大新闻系主任。解放以后，大学院系调整，他改任北大新闻系主任，一直勤勤恳恳，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新生力量。

去年，听到一位北来的朋友说，他在文革期间，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了！

他逃过了战火的浩劫，而竟逃不出这些妖魔鬼怪的魔爪，呜呼！

小康之局

《大公报》经过一番较量，总算在上海站住了。到一九三六年秋，发行已逐步上升，超过了《时报》和《时事新闻》，而跃居第三位。

上海不愧是一个大“码头”——全国商业和文化 的中心，销路一打开，广告也跟着源源而来；到那年冬天，大公每月的广告收入，据说已超过了天津版的最高数额。当时，李子宽兄告诉我，每月已净赢余一万余元。报馆附近郑家木桥有一块空地，胡政之有一天邀子宽兄和我去看了一会，后来，就听说已和地产商接洽购买手续，打算自造一座六层楼的馆址。显然，以知日派知名的胡先生，也没有预料到一年以后，上海将辟为战场，租界将沦为孤岛。

我那时也冲昏了头脑，把十里洋场当作安乐窝。把家安置好后，还买了一个摄影机，有机会就出去畅游江南山水。那时，我只二十九岁，正是精力充沛；无锡、苏州是旧游之地，当天可以来回。嘉兴也去过几次，也总是黎明看完大样